

论新民歌运动的现实语境及其乌托邦想象

首作帝,谢 晨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新民歌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在充满微观政治学的现代性空间中展开的全民文艺运动,符合了当时群众集体造势的倾向与诉求,并得以在特定的现实语境和场所中催生和构建起来。然而,新民歌运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推行主要传达的是由期待、豪迈和尽情释放的表达欲望交织在一起的浪漫主义,本质上带上了极具主观色彩的乌托邦想象,这场运动最终偃旗息鼓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新民歌运动;现实语境;乌托邦想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161(2012)05-0088-03

1942年,毛泽东在其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的所谓“工农兵方向”,明确了文艺的人民性立场,即着眼于广大工农兵的利益,表现工农兵的生活、思想情感,并采用工农兵喜爱且易懂的语言和形式进行文艺创作。工农兵文艺,并不是个人的文艺,而是阶级的文艺。其创作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性创作,而是代表工农兵整体利益的创作。工农兵文艺作为工农兵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必须以阶级的利益为目的,为革命的主体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的革命斗争服务,深入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从中汲取创作的养分。在此基础上还要批判地吸取中外文化遗产,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由此助力革命事业的发展。工农兵文艺的创作主体不仅包括专业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还包括创作通俗作品的工农兵群众本身。他们以同样的工农兵身份进行文艺创作,引导他们的就是能够体现阶级本质的工农兵思想感情。其创作方法是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从而使文艺作品更典型化,更理想化,更富有感召力。这种政治对文艺的干预与规训发展到顶峰状态,便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配合大跃进全面展开的新民歌运动,“工农兵方向”由此来了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总动员。

一、新民歌运动的现实语境

1958年至1960年,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浪潮,工业、农业、教育、文化、交通、卫生、邮电等各行各业的建设进入全民大跃进时期,竞相大放“卫星”,文艺领域也不甘落后,掀起了文艺大跃进,在这其中,“现代空间充满了一种微观政治学的隐喻”^[1],新民歌运动因其开展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参与人数之多而备受瞩目。“从新民歌创作和采风形成热潮以来,全国各地,甚至一个县、一个工厂、一个公社,也出版了民歌专刊、小册子。正是在这个广泛开展群众诗歌创作和采风的基础上,全省、市、自治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都出版了本省的民歌选集”^[2]。新民歌运动代表了当时的社会主义理想诉求,是文学与政治相互配合达到的一个最高峰。事实上,1957年新民歌已经出现在各地方兴修水利运动当中,基本上以民间话语自由自在的方式展开。到1958年,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个动向,在党的几次会议上格外强调指出民歌的创作、搜集与社会主义建设息息相关的问题,权威声音的直接介入为新民歌运动的开展指明了方向。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号召在各地领导机关的带动下依靠发动最广泛的群众开展这项工作:“这是一个出诗的时代,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

收稿日期:2012-05-28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师范大学课程实践教学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首作帝,男,湖南永州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谢晨,女,浙江瑞安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谣、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我们既要把它忠实地记录下来,选择印行,也要加以整理和研究,并且供给诗歌工作者们作为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的养料。诗人们只有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相结合,拜群众为老师,向群众自己创造的诗歌学习,才能够创造出为群众服务的作品来”。承接社论的指示,全国各省市党委机关先后发出关于组织收集民歌民谣的通知,并作为当前最迫切的一项政治任务来狠抓落实,这就是为什么短时间内各省、地、县、乡及至社争先恐后出版民歌集子的原因。同时,全国文艺界不断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向民歌学习。周扬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从理论上高屋建瓴地阐明了收集民歌的可行性方针政策。郭沫若回答《民间文学》编辑部的《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则是从实践方面为新民歌运动的架构出谋划策,他提出:“如果每隔一个阶段,比如每一个五年计划,编出一本真正是最好的民歌,在内容大体上差不多的各首当中选出一首最好的,合在一起,有三百首左右,成一本新的‘国风’,那就是了不得了!”这样,各方面力量聚焦于新民歌运动展现出一幅颇为值得期待的图景,且伴随着群众集体造势倾向的发生。

从创作形式上来看,新民歌运动继承了战争时期诗歌表现的诸多特征,以群众的集体创作为基础,走的是街头诗、墙头诗或者岩石诗的模式。“在这一年(1958)里,全国各省都出现了不少诗歌县、诗歌乡、诗歌社。在一些诗歌之乡的墙上、门上、山岩上、田壁上、树上、电杆上(挂着木制的或竹编的诗牌、诗画牌),甚至在商店的柜台上、烤酒的酒桶上、磨盘上,到处都是诗和画”^{[3](10)}。正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新民歌运动自然而然地成为一股宏大的文学思潮,显示出维护和巩固公共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强大力量。应该说,党的组织和领导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启动了新民歌运动,它的深层使命就在于,借用集体的诉求实现对社会主义领地的占领,新民歌的流行和活跃正是社会主义的一种隐喻表述。顺便提到的是,新民歌被用作整风的一种有力武器,因此,它也是反对个人主义的一种话语。邹荻帆把“民歌”和“诗”做了区分:“我们把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称之为‘民歌’;而把诗人、作家所写的,称为‘诗’。”^[4]在这样的情境下,个人主义诗作势必显得与新民歌运动的集体主义浪潮格格不入,既然后者代表了时代的唯一一极,那么前者也就理所当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与此背道而驰、互不相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新民歌运动成了反对个人主义诗作的一个例证。郭小川把新民歌称为“时代的最强音”和“探照灯”,而把知识分子表达个人情感的诗作称为“有气无力的叹息和幻梦”、“自我欣赏的说梦”,他列举批判了穆旦的《葬歌》:“你可是永别了,我的朋友? / 我的阴影,我过去的自己? / 天空这样蓝,日光这样温暖 / 安息吧,让我以欢乐为祭!”“哦,埋葬,埋葬,埋葬! / 我不禁对自己呼喊 / 在这死亡底一角 / 我过久地漂泊,茫然 / 让我以眼泪洗身 / 先感到忏悔的喜悦。”以及艾路的《抒情》:“轻飘飘将要来到的,是我的梦 / 梦啊! 你不要再撕裂我已经破损的心 / 你让我看见坟地、妖魔,我都可以 / 只是别再让我看见她的微笑,她明亮的眼睛。”郭小川斥之为个人主义者“平庸的灰暗的抒情和描写,实在不能给我们多少美的感受,更不要说什么生活的力量了”^[5]。或许,袁水拍借用毛泽东的“浇花”和“锄草”概念更能精辟概括更富于阶级斗争意识的阐述和批判:“我们有些诗群众不接受,是由于诗里的思想感情不对头,这是根本原因。群众干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而有些诗里是冷冷清清的个人的情调,群众自然不要看。更不必说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诗了,群众当然更加唾弃它们。我们必须进一步地揭露和批判它们,把这些毒草从我们的诗歌园地中清除出去。同时,我们也要彻底革掉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感情,使自己的作品里充满群众的、时代的声音。”^[6]在集体创作新民歌运动的时代,个人主义诗作似乎变得不合时宜,略显“矫揉造作”,它因之没有履行新社会和新制度的实践功能而无立锥之地,新民歌恰逢其时,成功地消除了这种差异而显得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二、新民歌运动的乌托邦想象

1959年,郭沫若和周扬从全国不计其数的大跃进新民歌中选出300首编辑出版《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出版,1959年9月第1版)一书,同时配发精美插图20余页,成为当时最权威的民歌选集。从题材内容来看,《红旗歌谣》分为四个部分,即“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和“保卫祖国之歌”,其中的寓意很明显,那就是新中国是一个工农兵阶级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前文提到对个人主义诗作的批判类似,知识分子被排除在外了。从文体格式来看,《红旗歌谣》试图创造出新时代的“诗三百篇”,它也在寻求与古典文学经典性的某种契合与呼应,同时配以“新时代”、“新思想”、“新内容”等展现当代风格的“新质素”,以便达到对“新中国”生机盎然形象的诗意塑造,正如

编者在前序中指出的：“这些新民歌正是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要与天公比高，要向地球开战的壮志雄心。他们唾弃一切妨碍他们前进的旧传统、旧习惯。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7]。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新民歌体现出除旧布新的战斗精神，二是新民歌呈现出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层含义。新时代的战斗精神在新民歌中以直奔主题的豪言壮语喊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达到”。这又与建设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并使之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理想目标取得一致，两者水乳交融。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经说过：“伟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家们确实总是不得不把不可能的事当作仿佛是可能的那样来对待。”^{[8](84)}站在这个角度和立场去看待新民歌表述得不加控制和超凡想象的某种不可能性的逻辑，这就不是孤立的现象了，例如传诵一时的《一挖挖到水晶殿》：“铁锄头，二斤半/一挖挖到水晶殿/龙王见了直打颤/就作揖，就许愿/‘缴水，缴水，我照办。’”以及《挑土》：“箬头装得满满/扁担压得弯弯/孩子的妈妈呀，你看看/我一头挑着一座山。”新民歌用这样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去描绘劳动场景和豪迈激情，本质上是革命胜利之后人民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与建构，这些积极的歌唱者是新社会的事实参与者，然而对于未来社会的规划一旦用艺术的表达方式体现出来，免不了打破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为着塑造新中国形象加入了大跃进这场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狂欢活动。在卡西尔眼中，卢梭借用伽利略研究自然现象的假设法去描摹未来社会的发展，其功能价值不容低估：“卢梭关于自然状态的描述并不是想要作为一个关于过去的历史记事，它乃是一个用来为人类描画新的未来并使之产生的符号建筑物。在文明史上总是由乌托邦来完成这种任务的。……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反对对当前现实事态的消极默认。正是符号思维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以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8](85)}。新民歌运动正是为着这样的历史任务而产生的一种复杂现象，在人类认识能力的转换途中，它试图在人的能力和人类世界的能力揭示中发现某种可取和可行的操作方法并对其进行慷慨激昂的转述和阐述，这种倾向由有着特定的价值判断语境场域所催生和构建，同时它所造成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失的，经过思想改造的著名说书盲艺人韩起祥到了 20 世

纪 80 年代，还是念念不忘用新民歌形式表达对家乡沧桑巨变的颂扬：“层层梯田像白云/麦田长得绿油油/站在高山往下看/真是社会主义的聚宝盆。”这就证明了新民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具备不断播撒传布的功能，“诗意存在于文学文本的虚构世界中，也同样存在于日常的文化生活中”^[9]。孙晓忠认为，文学存在两种创作方式，两种文风，分别为文章化和口语化，中国“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依然朝着文章化的道路越走越远，发表出来，却说不出声，从而离农村越来越远，因此重新认识新民歌意义的一个角度是“声音”，即是能歌能唱，人皆可诗，深入人心，“也许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去认识 1958 年新民歌运动”^[10]。事实的确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许多文艺工作者对新民歌的评价就是着眼于它的声音，把它比喻为能发声的乐器“战鼓”或者“号角”：“民歌是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的战鼓和号角，是向自然作斗争中的响亮号角”^[11]。从文艺的普及与提高观来看，新民歌运动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普及运动，它符合自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中国作家一直在追求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它通过发声练习和参与创作，对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民歌运动体现出来的探索性的另一方面是对于毛泽东“两结合”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诉求与检验。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在 1938 年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题词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但是并不成熟。1958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时明确提出“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同年 5 月 8 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6 月 1 日，周扬发表在《红旗》杂志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大力提倡和推广毛泽东的“两结合”，“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并为付诸实践找到了最佳载体，那就是随之兴起的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这无疑掀开了“十七年”文学走向“怎么写”探索之路的序幕，“形式之中蕴含着‘有意味’的内涵”^[12]。洪子诚这样评价“两结合”：“提出者本人对这一‘创作方法’并未作出任何进一步的阐释，但最明显的特征是，不管是文字表述上，还是精神实质上，‘浪漫主义’都被置于显著的甚或可以说是主导性的位置上。”^[13]（下转第 108 页）

非英语专业学生来说,也许有的学生英语学好了,但本专业没学好,母语水平也很差,这样的学生到底算不算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呢?最近上海曾举办过一次英语小说翻译大赛,最后是一位新加坡选手拿到了第一名,非常重视外语学习的上海选手却表现一般。赛后有专家评论说,上海选手失利不在外语,而在汉语水平差。参赛选手虽然读懂了英文,但是因为汉语水平不够,因而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表达或者就是表达得不够漂亮。这样的结果岂不是让中国人羞愧。曾看过一篇报道,说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其汉语水平最高时是在上高二的时候,看了之后本人深有体会。上大学时本人学的是英语专业,学英语学了这么多年,不仅不觉得自己的英语水平有多好,反而觉得自己的汉语水平是一落再落,远远不如自己上高中时的程度。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奥运会、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使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逐步提高。在这一大背景下,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正在逐年增多。而我国的孩子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强调学英语的重要,那么,若干年后,中国人的汉语如果还不如外国人的好,岂不是成了笑话!

(上接第90页)因此综合起来看,“两结合”的推行实际上主要传达的是由期待、豪迈和尽情释放的表达欲望交织在一起的浪漫主义,它为着文艺现状和现实亟需而分清主次,新民歌的“发声”练习和传唱功能恰恰为浪漫主义的抒写打开了通道,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亦凭借浪漫主义情势特征予以激活,故而在极短时间内,新民歌得以席卷全国。不过,浪漫主义本质上又是极具主观色彩的理想主义,随着大跃进弊端逐渐显露,各条战线高产“卫星”真相逐渐披露,并导致三年自然灾害,中国人民的“苦日子”来临了,人民面对现实,回归理性,创作热情锐减,新民歌运动也就自然偃旗息鼓了。

参考文献:

- [1]张中.从外部空间到外部思想[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 [2]贾芝.贾芝集·民间文学十年的新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总结

母语水平与外语成绩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这还需要通过研究来证实,但是外语教师确实常能观察到,母语表达能力出众、逻辑思维能力强、语言反应敏捷的学习者往往也拥有更好的外语表达能力。总之,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虽然汉语负迁移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一种阶段性现象,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汉语负迁移会逐步减弱。在英语学习中,一味地排斥汉语的学习态度是不应该也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 [1]刘润清,麦基(s.R.Magee),王平.语言学入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173-241.
- [2]郭铭华.论母语在外语课上的作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4):124-127.
- [3]Hudson,T.The effects of induced schema on the 'short-circuit' in L2 reading; non-decoding factors in L2 reading performance[J].Language Learning,1982,(32):11-31.
- [4]吕叔湘.中国人学英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3]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 [4]邹荻帆.民歌即景[J].文艺报,1959(5).
- [5]郭小川.我们需要最强音[J].文艺报,1958(9).
- [6]袁水拍.写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诗[J].人民文学,1958(4).
- [7]郭沫若,周扬.《红旗歌谣》编者的话[A].红旗歌谣[M].北京:红旗杂志社,1959.
- [8][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9]李圣传.文化与诗学的互构[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 [10]孙晓忠.有声的乡村——论赵树理的乡村文化实践[J].文学评论,2011(6).
- [11]徐嘉瑞.民歌——诗的源泉,诗的花朵[N].云南日报,1958-04-15.
- [12]曾礼军.宗教真实与文学想象[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 [13]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1996(2).